

專訪著名文化學者 劉傳銘：

中國文化走出去 兼容並包勿排外

劉傳銘簡歷

1949年生，安徽合肥人。1977年考入安徽大學中文系。曾任《文化周報》記者、編輯，1987年任安徽教育學院中國美術史教授。1988年公派赴德國奧勃斯維特藝術中心和不倫瑞克訪問學者。2002年被南京博物院、安徽博物院聘為客座研究員，2011年被中國文化書院（北京大學）聘為導師，2015年被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聘為教授（國學學科帶頭人）。現任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專家委員暨中國古建專項基金委員會主任。被學術界稱為「最清醒的批評家」。

主要著作及學術成果：《中國新時期繪畫美學思想概觀》、《繪事觀止》、《繪事物語》、《中國經典·繪畫卷》、《放思之美》、《論語註我》等。中央電視台百集大型紀錄片《百年巨匠》總撰稿。



劉傳銘 記者孟慶舒攝



劉傳銘在廈門論壇上講話。 受訪者供圖



劉傳銘在米蘭世博會頒獎典禮上致辭。 受訪者供圖

時下內地「國學熱」如火如荼，中國傳統經典重獲新生；在國家崛起的背景下，中國文化「走出去」成為熱門話題，東西方文化如何交流備受關注。著名文化學者、《東方國學叢書》主編劉傳銘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提出，真正的國學是心性之學，當下「國學熱」是國家文化發展新戰略與國人探尋精神家園的共振使然。他強調，中國文化走出去，可嘗試為人類面臨的危機提供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解決模式，以平和心態兼容並包，切忌民族主義式的自我膨脹。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、孟慶舒 北京報道

「文化是無腿的行走，」劉傳銘指出，文化是對話式的、服務式的、交流式的。中國文化走出去，可嘗試為人類面臨的危機提供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解決模式。「這個世界一定要有色彩斑斕的文化形態，若只有一種文化一統天下，還有什麼意思？」他反問道。

對比中西文化，劉傳銘認為，中華文明的特別之處，可用「詩性本真」四字概括。中國的詩歌注重心靈的開掘和情感的抒發，而西方的文化形態則以小說為代表，注重嚴密的邏輯思維和敘事，以及對外部世界的客觀描述。一個重情、一個重理，由此生發出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和價值思考。

兩種文明 兩種智慧

劉傳銘認為，中西文化基因不同，中華文化是宇宙觀文化，而西方文化注重局部。中國文化的特徵是文史哲不分家。「西方講科學，中國講學科，兩個字一顛倒，文化形態就不一樣了。」兩種文明不論高下，呈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智慧。

「胡適為什麼能寫出中國哲學史？」劉傳銘引述蔡元培的話指出，胡適經過國學的陶冶，又經歷西學的訓練，漢學的基礎和西學的方法

結合起來，促成現代意義上的開山之作。辜鴻銘、馮友蘭、張岱年等均有深厚的國學功底，同時又受益於西方方法論、邏輯學等有用之學，終成一代大家。而當下歷史環境不同，劉傳銘說，「今天讀國學書的，讀不懂西學，排斥西學。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，怎樣學國學、認識國學，就是擺在國人面前的重要課題。」

心態平和 跨越障礙

劉傳銘認為，中國文化要走出去，應以平和的心態，跨越地域界限和國家障礙，不能帶有民族主義色彩。如今中國經濟崛起，許多國人覺得中國可以說「不」，心態膨脹，而事實上中國文化真正能夠影響世界的，並非排外式的自言自語，而應是融合型的兼容並包，例如盛唐時期的東西文化交流。

同時，劉傳銘強調，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國人應該耐著性子慢慢來，傳播自己的思想價值和文化藝術，講好自己的故事，不必急於向西方文化靠攏，借用西方的手段也要恰如其分，不能非此不可，就像中國人一窩蜂去維也納大廳演唱。他認為，中國文化走出去，講真故事，打動自己，水到渠成，其它國家自然會感興趣。

國學非趕浪頭 修心性拂心垢

劉傳銘告訴記者，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經歷三輪「國學熱」。第一輪可追溯到「文革」結束、返本開新之際；第二波出現在千禧年前後；第三波「國學熱」興起於中共「十八大」之後。

談及當下這輪「國學熱」的成因，劉傳銘認為，無論是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首次亮相選於中國國家博物館，還是習近平主席參觀曲阜孔子研究院、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,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，這些活動均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，展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更加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，認同以國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精神遺產，折射出國家文化發展的新戰略。

看似無用 實則大用

而從社會層面，劉傳銘指出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部分國人已經不滿足於物慾的享受，重新思考金錢之外的人生意義。回歸傳統，從文化經典中汲取營養，探尋精神家園，漸成一種人文訴

求。在當下，讀國學看似無用，實則人生大用。「全是實用主義的東西，人生如何受得了？」國學的要義就在於它是中國人的心性之學，國學經典可以助人拂去心垢，培養心性，洞察智慧的深度，追求人生的樂趣。

當然，「國學熱」不排除有虛火。在商品化、產業化的推動下，國學一度被戲稱為僅次於股票、麻將的第三「熱」。「有火總比沒火好，至少贏得了國人的關注。」劉傳銘認為，檢驗國學是真熱還是虛火，至少有兩個標識：一是國學教育是否真正走進從小學到大學的課堂，成為終身教育，使國學由「熱」轉為常態；二是國學是否能創建一種核心價值，形成社會良俗、滋養人的道德。而放眼現實，劉傳銘承認，國學熱尚未觸及上述要害。他開玩笑稱，「想要毀掉一個東西，就把它搞成運動式的、浪潮式的。」而國學不是趕浪頭、追時髦，不能流於形式，而是安靜讀書，培養心性。否則，「自以為掌握國學精髓，實則距離真理更遠」。



劉傳銘考察山西太谷古塔。 受訪者供圖

兩岸三地 均有大儒

當今國學界，「大師」稱謂滿天飛。劉傳銘認為，要成為大儒，需對所學心存敬畏和包容，所謂「敬於詩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執於禮、游於藝」，唯有此境界，方能成就大學問，否則自我設障，難過心魔。他說，「我更願意稱之為『嚴肅的學者』」。

兩岸三地共享國學一脈，談及「嚴肅的學者」，在劉傳銘看來，香港有饒宗頤，台灣有南懷瑾、賴永海、傅佩榮，大陸有李零、樓宇烈、王守常、劉坤生、王小甫，從不同角度耕耘國學，各有建樹。例如北京大學的李零，他對孔子的研

究，確有過人之處。台灣的國學奇人南懷瑾，是借諸子之口，訴說自己的心性，其言閃爍智慧，不可輕棄。

台灣國學 自幼普及

而從國學保存和普及角度看，台灣值得稱道。台灣社會變革相對緩和，受歷史背景的影響，上一代台灣人從幼年起便開始背誦詩經，國學教育從幼兒園一直貫穿到大學畢業。台灣使用繁體字，亦有助於台灣人對古籍經典的理解。即使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，台灣年輕精英留學歐美，接觸到的西式文明範式同血脈中的中國文化基因找到對接，令台灣社會呈現出一種對「禮」的特別傳承。



談論語如數家珍 望讀者見異見同



一個冬日的下午，本報記者赴劉傳銘北京寓所採訪。門開啟處，劉傳銘身著對襟中裝，正微笑着迎接記者。

和煦的問候，溫暖的茗茶，一掃室外寒氣，令記者如春風拂面。在幾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，從國學熱到重讀經典，從大師標準到傳統教育，從中西文化差異到兩岸國學風貌，劉傳銘侃侃而談。其間閃爍的思想火花，令人如聆聽一堂國學課，感慨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在採訪結束之際，劉傳銘送給記者《東方國學叢書》中由他譯解的《論語註我》一書，並在扉頁上題字留念。國學經典「新選本」《東方國學叢書》於去年面世，引起社會反響。此套叢書作者陣容堪稱豪華：著名文化學者文懷沙、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、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王小甫等。榮譽主編是國學大師湯一介，劉傳銘擔任主編。

「論語一共15,863個字，再加上168個重字，一萬六千字從春秋註到現在，字義紛繁。除了政治的取捨以及《尊孔》和《批孔》的分歧外，從文本學的角度看，歷朝歷代都在註，堪稱思想寶庫。因此在『國學熱』裡，有值得保溫的部分。」說起論語，劉傳銘可謂如數家珍。

備採眾說 折中求是

當記者問及《論語註我》書名的含義時，劉傳銘解釋道，前人說過，「六經註我，我註六經」，按照馮友蘭的解釋，自己明白了客觀的道理，自己有了意，把前人的意作為參考，這就是「六經註我」。「本書取名《論語註我》，非自創新意，掩蓋前賢，而是力爭備採眾說，折中求是，以現時代的語言觀念申述原典。」通過這套叢書，劉傳銘期望讀者不僅能體悟到中國智慧的燦爛豐富，不僅見其異亦能見其同，還能發現先賢們對「天地人」解讀時殊途同歸的價值取向。



《論語註我》封面。 網上圖片